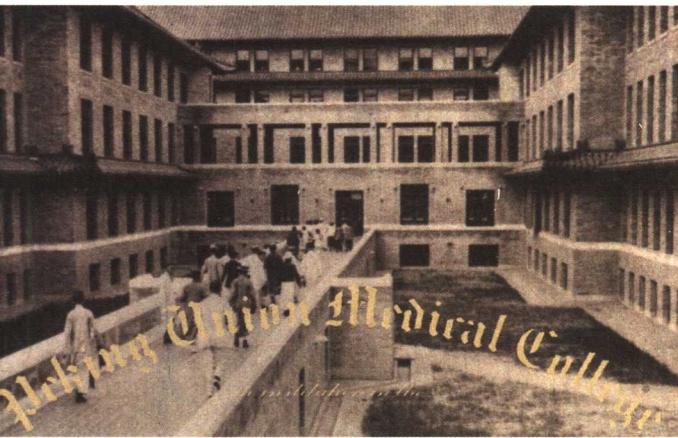


ing Union ical College

讴歌 编著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Liu chia-chih

Doctor of Medicine

...
you'll hear us.
Gwen 1000
Jest 1000
Dorothy 1000
In witness whereof
Gwen

The mitoses inherent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协和医事 / 叨歌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0
ISBN 978 - 7 - 108 - 02837 - 2

I. 协… II. 常… III. 医院—卫生服务—概况—北京市
IV. R1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5726 号

责任编辑 汪家明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图片制作 薛 宇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2.25
字 数 179 千字 80 幅图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R199. 2/1

2007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讴歌 编著

協和
医事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目 录

序 “协和”这两个字 5

第一章 遥远的东方有个“协和” 9

1. 望东方，酝酿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9
2. 20世纪初中国和美国的医学教育 18
3. 中西合璧的“油王府” 28
4. 1921：开幕典礼 37
5. 招聘最好的人，并让他们开心 48
6. 把护士变成天使的学校 61

第二章 “好医生”如何诞生 69

1. 准备一颗人文心、一副科学脑 69
2. 备受争议的协和育人模式 75
3. 启发那些“想成为自己的个体” 98
4. 师道，照亮校园 111
5. 毕业之后的“宝塔尖” 123
6. 内科大查房，八十多年一贯彻 135

7. 在“熏”的气氛中成长 145

8. 一个古老的命题 152

第三章 从“贵族医学”到“民众医学” 163

1. 医学“布尔什维克” 163

2. 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 168

3. 走出医院，走进胡同 171

4. 1930年代的“赤脚医生” 180

5. 给病人以温情的社会服务 189

6. 打开协和窗户看中国 195

第四章 协和的民间故事 214

1. 老协和人的脾气 214

2. 孙中山的最后岁月 223

3. 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 229

4. 装在“铁肺”里的人 236

5. “北京人”在哪里？ 243

6. 特殊时期的两部话剧 249
7. 五十六个小本和“百宝箱” 255
8. 老协和的女大夫 260

第五章 九十年“协和主义” 269

1. 1942：风雨飘摇 269
2. 光荣和梦想的征途 279
3. 协和式的临床思维 296
4. 自省、专注和慈悲 303
5. 医圣时代已过，良医余韵仍存 314
6. 新时代的大学精神 323
7. 大众视野中的协和吸引力 331
8. “协和现象”及“未来协和之道” 339

后记 我的协和情结与“泛意义协和” 350

主要参考书目 355

序

“协和”这两个字

1921年，当小洛克菲勒登上“亚洲快线”轮船时，《纽约时报》说“他去了中国”。同行的还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校长韦尔奇，他在六年前就造访过中国，为了一个建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计划。

这一行人登上“亚洲快线”后，引起了众人的注目。在小洛克菲勒的六只行李箱中，有一大箱全是书，其中一本是描写亚洲的《中国、日本和韩国》。韦尔奇则在轮船上被邀请做演讲，他的题目是《中国的医学教育》。乘客们被他的热情打动，特别是讲到现代科学的价值、西方医学如何助力中国文明、又如何适应中国需要而改良。但这些问题对已为“北京协和医院”准备了七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来说，再熟悉不过。

他们乘了一个多月的轮船，到达中国。站在离天安门不远的饭店阳台上，他们往东北望去，在王府井和东单之间，有一组中国宫殿式建筑，绿色琉璃瓦，汉白玉围栏，画栋雕梁。那片在清朝豫王府旧址之上、琉璃瓦之下的世界，就是即将创建的协和医学王国，老百姓传闻中的“油王府”。

协和的“志在世界一流”，并非今天大学运动中的空洞口号。她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让世界知道协和。1923年，美国《时代》周刊回顾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以来的十年之路。除了惊人的拨款数字，就是它在发展中不断锁定的中心主题：为全人类的健康。而耸立在这个主题两旁，是两大伟绩：一个在美国，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另一个则在中国，是PUMC——北京协和医学院。40年代，汤佩松在清华大学创办农学院时提出的目标是：“清华农学院应当办成中国农学界的PUMC。”1951年，新政府接管协和时指示：“协和医院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很有名望，我们一定要把她办好，办不好影响不好。”

协和的成长，充满了医学和医学之外的传奇故事。

这所学校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第一所招收女生的医学院校，有了中国真正的护士学校；这里的一位来自加拿大的解剖学教授，根据周口店的一块牙齿化石，确定出一个独特的人种——“北京人”，两年后在周口店挖出的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轰动了全世界；一位叫浦爱德的美国女人，来协和医院创建了“社会服务部”，关心病人出院后的社会链接，赋予医学以温情，许多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来此求职；一位叫兰安生的美国教授来到协和，给学生们讲“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他和中国人喝酒交朋友，带着协和学生走出医院，走进胡同，关注更多百姓的健康。日后他的一位学生受到感召，毕业后去了农村，在定县创造了中国“赤脚医生”的雏形。

这所学校的办学，也成了独特的“协和现象”。曾经的巨大投

入，在实施“淘汰制”、“宽进严出”之后，只有极少数的产出。而这每年平均十六位毕业生的“极少数产出”，后来却成就了中国医学界的大半精华，他们每一位都撑起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医学世界。在校园里和医院里，它曾拥有一批医学大家，教学严格并带有强烈的启发式，鼓励学生“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一批批年轻人来到这里，在协和式的气氛中“熏”着成长，内心的热忱被激发，体悟着怎样成为一位好医生。

今天的北京东单三条，协和建筑群的雕梁画栋、俄式大楼、现代大厦交杂在一起。一块标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门牌，提醒着时间的力量。在今天，这群建筑代表着：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对后两者，经九十年的积淀，人们概括为两个字：“协和”。

准确地说，“协和”这两个字暗示的是：曾经对中国医学教育和中国医学的推动，医事之道的至高境界。但她在时间打磨中积累的内涵，已超越了医学学科和医生职业。在民间，人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期望，赋予了“协和”许多延伸内容，这两个字渐渐演化成——医疗安全感、医学精英、关爱百姓的亲切姿态、病人重获健康与温情的可能。病人说：“我们千里迢迢到北京协和看病，是到了头。无论如何我们心甘了。”

到了新世纪，有报道题为《全国人民看病上协和》。2007年的一则“协和打假”新闻，告诉人们一个简单事实：全国那五十多家盗用“协和”名号的机构，其实在老百姓脑中偷换不了“协和”这两个字所蕴含的医事概念。

九十年后已是别样的时代。协和仍然矗立在沸腾生活中，呼吸着有些浑浊的现代空气。它锻造出来的第一代名医，多已不在世上，但名字恒久流传，成为不可复制的神话。西医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医疗再次成为中国的尴尬问题。今天的协和，更像一个警世者，提醒着人们什么是更纯粹的医学意义，什么是以实现这纯粹意义为目标的医学生活。虽然有人感叹，在数次中断、演化之后，协和已失去了一些内涵，但仍然是一清早门诊号就挂没了，仍然有一些协和人，拒绝平庸，保留着精英的自律，选择对病人最实惠的方案，仍然尽己可能维护着医患交流的正面形象。

在今天谈协和，不只是为了在曾经的功绩传奇中获得一种因怀旧而生的安慰，也希望通过解读九十年的协和医事，为眼前的医疗困境找到一些标准和答案：什么是卓越的医学院和优秀的医学教育？好医生是怎么产生的？什么是为医之道和为医的幸福感？病人在医生眼中是什么位置？医学如何去关心广大民众？这也许就是我和读者所共同关心的。

如果我们问，在九十年之后，“协和”这两个字，对中国老百姓、对医学生、对医生的吸引力，究竟来自哪里？也许是因为人们怀着这样一种不灭的期待：这个世界仍存医学温情，医学以己之力解除病痛。而协和曾以自己独特的医学方式，向人们展现了这种可能。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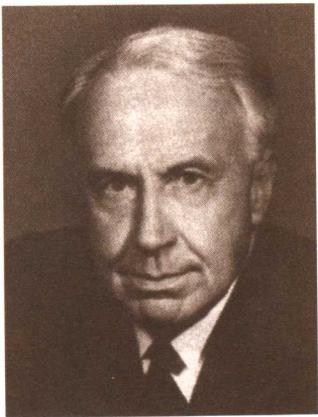
遥远的东方有个“协和”

1. 望东方，酝酿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站在 20 世纪的起点，美国正在进行一场足以拯救它的医学教育的革命。而中国的一位医学博士孙中山，则在酝酿着新的革命。另外一位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决意学医，试图以“新医学”来疗救病苦并促进中国人对维新的信仰。但他在仙台学医的第二年，“正值俄日战争，偶尔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于是化名鲁迅，用笔作为一把手术刀，试图切开中国人麻木的灵魂。相比之下，这时的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想法，则显得更加科学和实用。

在洛克菲勒之前，一批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试图用一种宗教的方式接近中国人的内心，而洛克菲勒在美国日渐浓厚的科学气氛的影响下，开始了在中国的新医学征途。

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多年，他参加过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创建和管理。1951 年，他写了



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多年，是1936—1948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多年之后，他对这所叫做“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学校，做过如下描述：“激动人心的故事——人与命运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

《洛克菲勒基金会故事》一书，其中有一章叫“中国的约翰斯·霍普金斯”，说的就是协和。其中写道：“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兴趣点，除了美国以外，它在中国的花费也是世界上最多的。”

多年之后，他把这所叫做“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学校描述为一个故事、一个理想：“激动人心的故事——人与命运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

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在19世纪末期发迹，在20世纪初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除了是“石油大王”之外，他还是一名基督徒。在发迹后，身边一位颇有远见的顾问建议他将精力转至慈善，成立慈善基金会。投入慈善的收入不纳税，总收入未减少，还能赢得乐善好施的社会形象。老洛克菲勒在六十岁时这么说：“我相信这是一个宗教任务：公平诚实地去赚你能赚到的钱，尽可能地攒住钱，然后尽可能地给出去。”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父子

左图：1928年《时代》周刊封面的老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六十岁的洛克菲勒说：“我相信这是一个宗教任务：公平诚实地去赚你能赚到的钱，尽可能地攒住钱，然后尽可能地给出去。”

右图：1956年《时代》周刊封面的小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Jr.）。杂志中有篇文章叫做《好人洛克菲勒》，他简朴、低调，从小父亲教育他如何获得、如何给予。洛克菲勒父子的慈善之道是：钱要用在“关键拐点”。

在他儿子小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也说：“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慈善事业上，专门用来接济贫困的大众，改进教育，发展科学及传播宗教，我以为可取。”

大手笔起自 1901 年。那一年在纽约建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共有十一座大楼，颇为壮观。从这家医学研究所里，先后走出了十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后来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William H. Welch），曾在这里任职。1909 年，洛克菲勒又出资防治黄热病和钩虫病。后来任教协和的第一位公共卫生教授兰安生（John B. Grant），毕业后最早参加的就是这场美国钩虫病防治运动。

所有的钱，必须是以“大规模的整体形式，而非零散的形式给出去”，“避免零打碎敲的捐款方式，避免在过于广泛的范围进行慈善活动”，洛克菲勒父子曾这么阐述他们的慈善之道。钱要用在“关键拐点”。而什么是关键拐点呢？在他们看来，必须是：根除某种疾病的致病因素，根除某种不良社会现象的原因，或者播种一种“有生命力”的观点，一种产生变革的能量。基金会的资金必须用在“大规模的示范”，以便他人能复制，最终得到传承和延续。

当 1910 年轰动美国医学界的“弗莱克斯纳（Flexner）调查报告”说到，在美国和加拿大共一百五十五所医学院校中只有六所好学校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看到了“关键拐点”。自此，他们动用大笔金钱，投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建立新的医学、护理、公共卫生学院，提高那些已存在的学校的水平。

据美国《时代》周刊记载：从 1913 年 5 月开始的十年内，洛克菲勒基金会花费了近八千万美元，其中，超过一半的钱用于公共卫

生和医学教育。而“最大的单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截至那时，用于协和共计一千万美元，比用于约翰斯·霍普金斯的七百万美元还多得多。据1956年统计，实际上，加上后来的投入，基金会为打造北京协和医学院总计投入四千八百万美元。

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rick Gates)就是建议洛克菲勒把财富用来转做慈善的那个顾问。他一直对中国怀着浓厚的兴趣，希望在这里实施一项计划。他最初向洛克菲勒提出的建议是——在中国建一所大学。在那时的西方人眼中，中国贫穷、落后、文盲很多，是“异教徒”之国，是疾疫流行的“东亚病夫”之国。

洛克菲勒在正式行动之前，总是先作精细调查。为在中国建一所大学，他前后三次派出考察团来中国，分别是1909年、1914年、1915年。

1909年派出的“东方教育考察团”团员中包括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医生。他们突出提到中国在医学教育方面的迫切需要，建议在北京成立一个自然科学的教育机构。洛克菲勒初步认为在中国的计划不宜过大，宜限于医学事业。

1911年在美国成功进行的钩虫病防治，加上著名的Flexner报告的问世，使得洛克菲勒更加关注医学、卫生、医学教育。

1913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次会议上，董事会在《远东的教育及其他需求》的报告中说，“必须对远东的教育采取行动，包括医学教育和建立好医院。”两个月后，专门对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在中国的项目首选医学，投资中国的医学教育，“渐进有序地在中国发展一个完善的、有效的医学系统”，并派考察团去中国进行更详尽的考察。洛克菲勒在会上说：“基金会现在还是一个

小孩，很年轻，没什么经验。世界都是它的试验场……它准备在起步时慢慢发展，希望在不同的可行领域，先收集所有能收集的信息，以便日后真决定去做时，明白可能面对的问题，并在我们所能得到的最佳建议下行动……我们对中国感兴趣已经好几年了。”敏锐的“石油大王”看到了“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机会，空前绝后”。

1914年派往中国的考察团，考察范围锁定中国的医学教育。考察团中有哈佛医学院内科教授、芝加哥大学校长、美国驻汉口总领事。这位美国驻汉口总领事，名叫顾临（Roger S. Greene），他此后的二十年时间都贡献给了洛氏驻华医社与协和。

考察团用四个月时间，访问了中国十几个城市的医学校和八十八家医院，最后总结成一份名为《中国的医学》的报告。这份报告，至今仍是西方人写成的中国医学教育的宝贵史料。《中国的医学》共十个章节，包括：中国卫生现状、中国本土医学和手术、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教运动的医学教育标准、用中文还是英文教学、解剖和尸检、中国政府对西方医学的态度、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的态度、相关建议及预算。

在报告中描述的中国医学教育水平很低。所有医学校的师资水平和教学设备都很差，学生的预科教育不足，用中文教学有很大局限。即使是当时的教会医学校，也大都是1900年前后新办，外国教员的专业知识跟不上时代。

第九章的“委员会建议”及第十章的“财务预算”，直接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委员会建议”中提到：要做好长期准备，去做在中国的医学工作；在这期间的医学发展，基金会必须

是最重要的推动因子，要视野广阔长远；教育应以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为目标；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应鼓励医学院校开展研究；暂时不大力开展公共卫生或建立专门研究机构。

考察团赞同在中国办医学教育，地址在北京和上海，尽量与已有教会学校合作。选择北京的理由是：北京是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是文化教育中心，易于吸引全国各地学生；当时教育部正努力统管全国的教育政策，加上“旧协和”已有基础，且是被中国政府承认的学校。选择上海，是因为人口多，需要医师。

关于新建的北京协和医学校的标准，考察团曾在中国广泛征求意见，当时有两种看法：一种主张标准可以低一些，以适应目前急需；另一种主张从长远利益出发，要求办高标准的学校，以便培养高级人才，将来可以占重要的领导地位，发生更大的影响和作用。考察团同意后一种意见，这可以解释后来的协和为什么是长学制，为何自办预科，为何用英语教学。考察团还建议日后的新校，招收女生和办一所高级护士学校。

一旦目标确定，分秒必争。一本关于协和的英文书中这么描述：“No time was lost。”在决定后的十来天，就专设了“洛氏驻华医社”（China Medical Board），主席为洛克菲勒之子，成员中有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芝加哥大学校长，哈佛医学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教授。顾临为洛氏驻华医社的驻华代表，主持洛氏驻华医社在中国的事务。

小洛克菲勒写了一封信，发给在华有医学工作的美国传教组织，介绍了即将在中国实施的医学计划。在谈到协和如何选择人才时，他提到“选择那些品学兼优，有悲悯的传教士精神和动力